



朱玉麒 主编

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写本题记与祆教初传高昌问题
麹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墓葬初论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里正的上直
唐代西州天山军的成立
吐鲁番新出《洪奕家书》研究
国家宫观网络中的西州道教——唐代西州道教补说
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

关于东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中古时期巴蜀地区的粟特人踪迹
求法僧眼中的于阗佛教（3~6世纪）
——兼及和田出土佛教写本

黑水城出土西夏新译《心经》对勘、研究
——以俄藏黑水城文献TK128号文书为中心
于阗文P.2741文书所见鞑靶驻地Buhäthum考
阿力麻里出土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墓碑碑文考释

Π. 科科夫措夫撰；陈开科译

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
殖民背景下的西方国家之新疆研究
——以19世纪的英国为中心

荣新江
倪润安
张雨
刘安志
韩香
雷闻
王媛媛

贾丛江
姚崇新

广中智之

沈卫荣
白玉冬

榎一雄撰；易爱华译

贾建飞

西域文史

沈卫荣

【第二辑】



西域文史

(第二辑)

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Vol. II

朱玉麒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西域文史》是由新疆师范大学西域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论集。本辑发表与西域相关的学术论文 15 篇,内容涉及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学术史等方面。

本书适合于从事西域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等相关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文史. 第2辑 / 朱玉麒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03-020643-5

I. 西… II. 朱… III. 文史资料—西域 IV. K294.5 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5416 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 责任校对: 朱光光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邱 炯 陈 敬

封面题签: 冯其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0 插页 1

印数: 1—2 000 字数: 464 000

定价: 7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西域文史》编委会

主 编 朱玉麒

编 委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列)

- | | |
|------|------------------|
| 陈开科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 广中智之 |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研究中心) |
| 贾丛江 |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 李 肖 | (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
| 刘安志 |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
| 孟 楠 | (新疆大学历史系) |
| 孟宪实 |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
| 荣新江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
| 施新荣 |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 |
| 王 欣 |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
| 王东平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
| 王启涛 |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
| 姚崇新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
| 于志勇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
| 余 欣 | (复旦大学历史系) |
| 张铭心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 |
| 赵 莉 |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 |
| 朱玉麒 | (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 |

英文编审 崔延虎 王媛媛

金光明經卷第二

凡五千四百三十三言

庚子歲月十三日於高昌城東胡天南太后祠下為素將第佛子妻息合家寫此
金光明一部斷手託竟筆墨人好書者手想具字而已後有能經
持之者貴其懷義成佛道

图版1 《金光明经》卷二题记

終建運二武皇帝無寧世不備
海風走皇味臨增意緒傳音歡
不奈。望人取編載歌起君脫
伏願得善報和少旅萬福安
永已來至於兩州經今三武隨身
力還身九年用是五不之少右
元七年五月五日夜白北運仙
今某薄禮果無因少白有無日
國之日以矣今年身位苦路不
年身同河東等國度思推根不
其前是梨果和身身不宣

0 5厘米

图版 2 《洪奕家书》(2004TAM396 : 14, 背面)

目 录

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写本题记与祆教初传高昌问题	荣新江 (1)
麹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墓葬初论	倪润安 (15)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里正的上直	张 雨 (75)
唐代西州天山军的成立	刘安志 (89)
吐鲁番新出《洪奕家书》研究	韩 香 (101)
国家宫观网络中的西州道教——唐代西州道教补说	雷 闻 (117)
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	王媛媛 (129)
关于东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贾丛江 (155)
中古时期巴蜀地区的粟特人踪迹	姚崇新 (169)
求法僧眼中的于阗佛教 (3~6 世纪) ——兼及和田出土佛教写本	广中智之 (183)
黑水城出土西夏新译《心经》对勘、研究——以俄藏黑水城文献 TK128 号文书 为中心	沈卫荣 (217)
于阗文 P. 2741 文书所见鞑靼驻地 Buhāthum 考	白玉冬 (231)
阿力麻里出土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墓碑碑文考释	II. 科科夫措夫 撰; 陈开科 译 (245)
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	榎一雄 撰; 易爱华 译; 朱玉麒 校订 (255)
殖民背景下的西方国家之新疆研究——以 19 世纪的英国为中心	贾建飞 (297)
《西域文史》第二辑著译者单位及文章索引	(309)
《西域文史》简介与稿约	(310)

Contents

Colophon of <i>Golden Light Sutra</i> from Turfan and the Early Introduction of Zoroastrianism in Gaochang Area	Rong Xinjiang (13)
A Study of the Tombs from QushiGaochang Kingdom to Tang Dynasty in Turfan	Ni Run'an (74)
The Duty System for <i>Lizheng</i> in Tang Dynasty as Reflected in the Documents Unearthed in Turfan Area	Zhang Yu (88)
The Establishment of 'Tianshan Troop' of Xi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Liu Anzhi (100)
Research on Hongyi's Homeletter unearthed newly in Turfan	Han Xiang (116)
In the Network of the State-sponsored Daoist Monasteries of Tang Empire: A Supplement of Daoism in Turfan during the Tang China	Lei Wen (126)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to the Foreword of the Middle Persian Hymn-book <i>Mahrnāmag</i>	Wang Yuanyuan (153)
Some Issues about the Han Peopl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Jia Congjiang (168)
On the Trace of Sogdians in Bashu Area in Mediaeval Times	Yao Chongxin (182)
Buddhism in Khotan, Seen by Chinese Pilgrims Toward West (3~6 Century A.D.): Also Referring to Buddhist Manuscripts Excavated from Khotan Area	Hironaka Tomoyuki (216)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the heart sūtra</i> of Tangut Origin; Study on the TK128 Document of Khara Khoto Manuscripts Preserved in Russia	Shen Weirong (228)
A Study on the Tatar Settlement 'Buhäthum' Recorded in the P. 2741 File of Khotan Scripts	Bai Yudong (242)
A Study on the Syrian Nestorian Tomb-Tablet Inscriptions Unearthed in Arimali	П. КОКОВЦОВ (254)
On Xu Song's Investigatio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Enoki Kazuo (295)
Xinjiang Studies in Western Countries on the Background of Colonization; Focus on British Study on Xinjiang in 19 th Century	Jia Jianfei (307)
Contributors	(309)
Introduction to the <i>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i>	(310)

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写本题记 与袄教初传高昌问题

荣新江

1965年1月，在吐鲁番安伽勒克（Anjanlik，又称英沙故城、安乐城）南郊附近的一座废佛塔下层，一位农民发现了一个陶罐，罐内装有《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三国志·魏书·臧洪传》、《汉书·王莽传》、《金光明经》卷二、贝叶梵文写经、回鹘文木简等文献和文物材料，交文物工作者，入藏于新疆博物馆。

本文主要讨论的《金光明经》卷二题记文字如下（图版1）：

- 1 《金光明经》卷第二 凡五千四百卅三言
- 2 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
- 3 《金光明》一部，断手讫竟。笔墨大好，书者手拙，具字而已。后有聪叟揽
- 4 采之者，贯其悞义，庶成佛道^①。

本录文的基础是1995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主持的吐鲁番文献读书班的成果，我们在前人录文的基础上释读出若干文字，其中以史睿的功劳最大。近年，王丁先生在总结前人校录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参考李遇春、王素和张广达先生的录文和解说，又读出“揽”字，从而给出较为正确的录文^②。“揽”字前人过去没有释读出，对照图版，可以信从。唯“庶”字其录文依前人作“疾”，与我们的释读不同。

本文主要讨论围绕这条题记而引发争论的两个问题。

一、庚午岁 = 公元430年

这组收集品发现后，因为内容庞杂，没有随即发表一个总体的报告，其中一些重要的资料，陆续由不同的专家发表。其中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最早由郭沫若先生在1972年撰文发表，所以早为国内外学界所知^③。与此同时，作为出国文物展览所选精品，《金光明经》卷二写本的尾部图版，发表在多种外文版的《新中国出土文物》

① 图版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丛书》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图版84。

② 见其所撰《南太后考》，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10），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431页；又《吐鲁番安伽勒克出土北凉写本〈金光明经〉及其题记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40页。

③ 郭沫若《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文物》1972年第8期，2~6页。

中^④,从而为一些敏锐的海外学者所注意。饶宗颐教授在《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一文中,指出这里的“胡天”系胡天神,或胡天祠,又对比同时出土的东晋写本《吴书·孙权传》,考订“庚午岁”为公元430年^⑤。

然而,国内学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看到饶宗颐教授的文章,而是根据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和新疆博物馆合撰的《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中不完整而且有误的录文“城南太后祠下胡天”来展开论述的^⑥,这自然会影响对题记本意的理解。

关于题记的年代,一般都遵从饶宗颐的看法,定在430年,如系统研究敦煌吐鲁番写本题记的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写本识语集录稿》^⑦,专门研究祆教流传的姜伯勤先生的《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⑧,都持这种看法。笔者在1987年撰写《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一文时,也采用这个年份的看法^⑨。虽然文章限于体例,没有举出理由,其实当时的想法,一方面是根据饶宗颐教授从书法角度所作的判断,另一方面是根据王素考察高昌郡和高昌国文书所得的结论,即高昌地区指称佛寺时,460年以前称作“祠”,460年以后称作“寺”^⑩,因此本卷当在460年以前的430年。

198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李遇春先生发表了《吐鲁番出土〈三国志·魏书〉和佛经时代的初步研究》一文,首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1965年安伽勒克这批写本发现的经过,并且给出编号为65TIN029的《金光明经》卷二题记的全文。对于《金光明经》题记中的庚午岁,李遇春先生认为是490年,理由是430年时高昌不可能有太后祠,只有到了北凉沮渠安周在位时,高昌已是王国,作为王国才拥有“太后”,而坐落于都城王室供养庙宇“太后祠”就顺理成章了^⑪。

此后,王素先生在《吐鲁番出土张氏高昌时期文物三题》一文中,改变自己原本遵从的430年说,对490年说做了详细的论述,大意是:河西、高昌诸王国,依制王母只称太妃,不能称太后。但北凉沮渠蒙逊子牧犍尚北魏太武帝(世祖)拓跋焘妹武威公主为妻,437年北魏封牧犍母为“河西国太后”。及北凉灭于北魏

④ 我所使用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日文本《新中国の出土文物》,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年,图122。

⑤ 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下,香港,1978年;此据《选堂集林·史林》中,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480页。

⑥ 《文物》1977年第3期,26页。参看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168页。

⑦ 《三藏》187号,1979年,5页;此稿后来发展成《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一书,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该题记在84页, No. 74。

⑧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ー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东西交涉》第5卷第1号,1986年,39页,注②。此文后来作为一章,收入作者《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该题记的讨论见236页(未标年代)。

⑨ 荣新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胡戟等《吐鲁番》,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32页。

⑩ 王素《高昌佛祠向佛寺的演变》,《学林漫录》第1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37~142页。

⑪ 《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42~47页,有关题记年代,见44页。此文原本是提交1988年在北京举行的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原文附有全部发现品的“文物登记表”,可惜正式发表时没有附上。因为这个表迄今尚未再次发表,所以笔者手中一直保存着它,并以它为指南,两次到新疆博物馆考察这组文书的部分原件。

(439), 牧犍降, 被迁到平城。其母卒, “仍以王太妃礼葬焉”。447 年, 牧犍赐死。但此前的 442 年, 牧犍弟无讳、安周经鄯善北上据高昌。443 年无讳建高昌大凉政权, 改元承平。只有北凉流亡政权, 才有可能为其母在高昌地区建“太后祠”。此外, 王素还援引吴震《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中的说法^⑫, 认为北凉纪年用“岁次××”, 高昌义熙以后(510 年后)才用“××岁”的说法, 故此 490 年为过渡形式^⑬。

此后, 没有关于这件题记中庚午岁年代的讨论, 学者间各自用各自的说法。然而, 这个年代涉及祆教进入高昌的最早记录的时间问题, 所以不能不辨。

先来看看 430 年前后河西、高昌的主要事件, 我们把能够确定年代的文书也系入年表当中:

公元纪年	甲子纪年	年号	纪年	事件
401	辛丑	西凉庚子	二年	后凉吕隆杀吕纂, 自立为天王, 改元神鼎。
				沮渠蒙逊攻杀段业, 号张掖公, 改元永安。
402	壬寅		三年	后秦姚兴拜李暠为安西将军、高昌侯。(表明李暠已据有高昌)
403	癸卯		四年	南凉秃发傉檀及北凉沮渠蒙逊攻姑臧。吕隆迁长安, 后凉亡。
405	乙巳	建初	元年	李暠称凉公, 改元建初。迁居酒泉。鄯善、车师前部王入贡。
408	戊申		四年	秀才对策文。(文书壹, 57 页)
411	辛亥		七年	沮渠蒙逊攻占姑臧。
				兴达写《妙法莲华经》题记。(识语, 81 页)
412	壬子		八年	沮渠蒙逊迁姑臧, 称河西王, 改元玄始。
415	乙卯		十一年	张仙文书。(文书壹, 6 页)
416	丙辰		十二年	进业写《律藏初分》于酒泉西城陌北祠 ^⑭ 。
417	丁巳		十三年	李暠卒, 子歆继为凉公, 改元嘉兴。
				晋军入长安, 后秦亡。
418	戊午		十四年	赫连勃勃据长安。
				严福愿赁蚕桑券。(文书壹, 6 页)
419	己未		十五年	(?) 残文书。(文书壹, 13 页)

⑫ 吴文载《文物》1983 年第 1 期, 26~34 页。

⑬ 王文见《文物》1993 年第 5 期, 57~59 页。参看王素《高昌文书编年》,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7 年, No. 282, 建初二年(490 年)条;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181 页。

⑭ 北 0868,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记录》, 82 页, No. 64。

续表

公元纪年	甲子纪年	年号	纪年	事件
420	庚申	嘉兴	四年	刘裕代晋, 国号宋。沮渠蒙逊杀李歆, 占敦煌。后歆弟恂重据敦煌。
				残文书。(文书壹, 13 页)
420	庚申	北凉玄始	九年	十一月 衣物疏。(S. 6251)
421	辛酉		十年	沮渠蒙逊灭西凉。鄯善王比龙入朝, 西域诸国称臣。隗仁为高昌太守(?)。
422	壬戌		十一年	沮渠蒙逊弟京声西游于阙取经, 还至高昌译出。
				马受条呈。(文书壹, 61 页)
423	癸亥		十二年	蒙逊所署晋昌太守唐契反, 与弟和及甥李宝奔伊吾, 柔然封为伊吾王。
				兵曹、郡府等文书。(文书壹, 14~16 页)
424	甲子	大夏真兴	六年	蒙逊南北受敌, 称臣于夏, 用其年号。
				智猛自天竺回, 携《大般涅槃经》至高昌, 蒙逊遣使取梵本, 命昙无讖译出。
				帐。(文书壹, 33 页)
425	乙丑		七年	衣物疏。(文书壹, 28 页)
426	丙寅	大夏承光	二年	夏主赫连勃勃死, 子昌为大夏王。沮渠蒙逊借夏国兵力抵御西秦。继续用夏年号, 略改为“承阳”。
				十一月户籍。(德藏 Ch. 6001)
				十二月, 北魏攻取夏之长安。
427	丁卯	无纪年		四月廿三日, 河西王世子大且渠兴国于都城译经题记。(大谷文书, 京都博藏, 吐峪沟出土)
				六月, 北魏军攻入夏都统万城, 大获而归。赫连昌奔上邦。
428	戊辰			二月, 魏攻夏之残余势力, 赫连昌被俘, 弟定即位。
				六月, 北凉改元承玄。蒙逊遣使朝贡于魏。
429	己巳	无纪年		六月十二日令狐岌为贤者董毕狗写《法华经》讫校定。(吐鲁番出土, 书道博藏)
430	庚午	无纪年		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写《金光明经》。
431	辛未			西秦灭于夏。夏攻北凉, 为吐谷浑击败。沮渠蒙逊改元义和。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432	壬申	北凉义和	二年	左部文书。(文书壹, 35 页)

续表

公元纪年	甲子纪年	年号	纪年	事件
433	癸酉		三年	沮渠蒙逊卒，子牧犍继立，改元永和。魏拜牧犍河西王。
				文书、名籍。（文书壹，62~63页；2006年洋海出土文书）
		缘禾	二年	文书。（2006年洋海出土文书）
434	甲戌	北凉缘禾 (北魏延和)	三年	九月 于田地城北刘居祠写《大云经》。（Φ. 320）
435	乙亥	高昌缘禾	四年	柔然、焉耆、车师朝魏，魏遣王恩生等使西域。
				十月 沮渠势力撤出高昌，阚爽为太守。
436	丙子		五年	高昌文书。（文书壹，47、66页）
				北凉使用北魏太延年号，写作太缘。
437	丁丑		六年	高昌文书。（文书壹，85页）
				北凉停用北魏年号，改元为承和，年份仍依永和计算。不久改元建平。
				董琬西使。
439	己卯			六月，北魏灭北凉，沮渠牧犍降。

注：文书 =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识语 =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从上面的年表可知，424年北凉沮渠蒙逊称臣于夏，用其“真兴”年号。426年继续使用大夏年号，只是略作改变，把“承光”改作“承阳”，吐鲁番出土有承阳二年十一月户籍。关尾史郎、吴震认为承阳二年北凉停用大夏年号，王素认为在承阳三年（427）十二月^⑮。王素的看法似有问题，因为本年六月，北魏军队攻入夏都统万城，夏主赫连昌奔上邦。大夏都城失陷的消息肯定会传到北凉，所以至迟在六月份，北凉恐怕就不会再用大夏纪年。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自上一年的十月就开始率大军攻夏，十二月北魏取长安，这些消息可能早就影响到北凉。我们看到吐鲁番有承阳二年十一月的户籍，但这并不表明当时北凉都城姑臧仍用大夏年号，因为消息从姑臧到高昌，总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我推测大概从承阳二年十月，北凉就不用大夏年号了，但这个消息恐怕要到年底才传播到高昌地区，因此有承阳二年十一月的户籍。大谷探险队在吐峪沟所获的《优婆塞戒本》卷七题记称：

岁在丁卯（427）夏四月廿三日，河西王世子、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大沮渠兴国，与诸优婆塞等五百余人，共于都城之内，请天竺法师昙摩讖，译此在家菩萨戒，至秋七月廿三日都讖^⑯。

这个题记出自河西王沮渠蒙逊之子的手笔，而且写在都城姑臧，却不用承阳三年年号，表明此时北凉确已放弃使用大夏年号，但也没有使用其他年号，因为此时的政治形势尚不明朗。

^⑮ 王素《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17~18页。

^⑯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83页，No. 72，图8。

428年夏历二月，北魏攻击大夏残余势力，赫连昌被俘，弟赫连定即位，改元胜光。四月，赫连定遣使请和于魏，拓跋焘手诏其投降。六月，北凉改元承玄，但未见在吐鲁番地区行用。沮渠蒙逊遣使朝贡于魏。可能在大夏屡败于北魏的情况下，北凉不再用大夏年号，虽然有自己的新年号，但未敢行用，而是朝贡于魏，来观察形势。吐鲁番出土文书，似乎能够证明此后北凉没有使用自己的年号，即现藏书道博物馆的令狐岌为贤者董毕狗所写《法华经》，署“己巳岁（429）六月十二日”^{①⑦}。然后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庚午岁写《金光明经》。到431年，沮渠蒙逊改元义和，遣子安周入侍于魏，正式作为北魏的附庸。大概在得到北魏的许可后，我们看到有432年的署作北凉“义和二年”的吐鲁番文书被发现^{①⑧}。转到下一年（433），沮渠蒙逊卒，子牧犍继立，改元永和，但吐鲁番文书仍用“义和三年”的纪年^{①⑨}，可能是没有得到改元的消息。同年，魏拜牧犍为河西王。434年，吐鲁番出土《大云经》，系北凉缘禾三年九月于田地城北刘居祠所写（Φ. 320），论者一般认为“缘禾”是北凉采用北魏“延和”年号的变通写法。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427~430（可能到431）年间，由于政治形势的关系，高昌地区不使用年号来纪年，而是单纯地用甲子纪年，这是这件为官人索将军所写《金光明经》不使用年号，而用甲子纪年的大背景。

返观490年前后的情形。我们知道488年高车杀阏氏高昌国王阏首归，立敦煌人张孟明为王。489年，张氏改元“建初”^{②①}。我们现在见到有吐鲁番出土建初二年岁在庚午（490）九月廿三日功曹书佐谦奏^{②②}、建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太岁□（丁）亥（495）高昌郡高昌县苏娥奴枢铭^{②③}，表明从490年到495年，高昌地区的文书纪年都用建初，不用甲子，这也反证把《金光明经》题记的庚午岁放到490年是不妥的。

还要考察的是“太后祠”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北凉流亡政权，才有可能为其母在高昌地区建“太后祠”呢？

《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称：“〔张骏在位〕二十一年（344），始置百官，官号皆拟天朝，车服旌旗一如王者。”《魏书·张寔传》记：“始置诸祭酒、郎中、大夫、谒者之官，官号皆拟天朝而微变其名。舞六佾，建豹尾，车服旌旗一如王者。”前凉张氏的官号既拟天朝，其母称太后也是有可能的。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曰：“以升平元年僭称大秦天王，改元永兴，追谥父雄为文恒皇帝，尊母苟氏为皇太后，妻苟氏为皇后，子宏为皇太子。”同上《苻坚载记》下曰：“坚兄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泄，徙阳于高昌。”前

①⑦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83~84页，图9。

①⑧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35页。

①⑨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63~63页。

②① 关于此“建初”之归属于张孟明，本文采用白须净真和王素的观点，参见白须《高昌墓砖考释》（三），《书论》第19号，1981年；王素《吐鲁番出土张氏高昌时期文物三题》，55页。

②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86~87页。

②③ 《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图110。王素《吐鲁番出土张氏高昌时期文物三题》对这两件文书有详细论证，特别是他在新疆博物馆见到该枢铭原件，对于前人录文有订正，见该文54~57页。

秦苻坚建元十二年(376)八月灭前凉,据有高昌,大概建元二十年(384)春夏之交转属羌人姚萇。前秦王族既然曾至高昌,当然也就有可能为其祖母立太后祠。

《晋书·吕隆载记》记:401年,吕隆僭天王位,母卫氏为皇太后,但旋即败亡。王素认为这是一个例外。实则此前396年吕光已称天王,399年光子绍即位为天王,他们的母亲都可能被尊为皇太后。394年,吕光遣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因此,后凉统治高昌时期(385~397),高昌也可能立太后祠。

因此,我们并不能够排除在北凉流亡政权到来之前,高昌地区建有“太后祠”的可能性。

再来看“祠”的问题。

原本王素认为高昌地区指称佛寺时,460年以前称作“祠”,460年以后称作“寺”^②。但后来他又认为:“佛教梵字由‘祠’向‘寺’的演变,应是渐进的,其间有一个并存的阶段。阚氏、张氏、马氏等高昌国或许正处在这个阶段。”^③

目前所见高昌及相关地区祠的资料如下: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新0868号《律藏初分》卷三题记:“建初十二年(416)十二月廿七日,沙门进业于酒泉西城陌北祠写竟,故记之。”^④这件写经是解放后作为敦煌文书入藏的,如果原本属于敦煌文献,则这里的酒泉就有两种可能,即河西的酒泉或吐鲁番的酒泉,两地的写本都有可能传到敦煌。如果是吐鲁番出土文献,则这里的酒泉更可能是高昌的酒泉。

吐鲁番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僧口渊班为悬募追捕逃奴事》提到有“唐司马祠”(75TKM96:21)^⑤。同墓出土文书年代在北凉玄始十二年(423)至义和二年(432),本件文书大体在此范围。

俄藏敦煌文献Φ.320《大方等无想大云经》卷六题记:“缘禾三年岁次甲戌(434)九月五日,于田地城北刘居祠写此尊(经),愿持此功德,施与一切众生,俾得摠持,超入法城,获无生忍,成无上道。”^⑥这件被编在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写经,从纪年到田地城这样的吐鲁番地名,早已被学者判定出是吐鲁番文献^⑦。据此,刘居祠位于田地郡城的北面。

^② 王素《高昌佛祠向佛寺的演变》,137~142页。

^③ 王素《吐鲁番出土张氏高昌时期文物三题》,57~58页。

^④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82页, No. 64。

^⑤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36页。

^⑥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5册,168页;《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84页, No. 77。

^⑦ 孟列夫主编《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II,莫斯科,1967年,661页;汉译本《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204~205页;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40~41页;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80页;吴震《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29~32页;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あいだ——<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五)》,《纪尾井史学》第5号,1985年,1~11页;白须净真《高昌、阚爽政权与缘禾、建平纪年文书》,《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1号,1986年,77~78页;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89页。

吐鲁番哈拉和卓 91 号墓出土文书《阚爽建平五年（441）七月廿一日祠口马受属》的“祠口”即“祠吏”（75TKM91:18b）^②；同墓出土《祠吏翟某呈为食麦事》中有祠主、祠吏名（75TKM91:16a）^③；又出《残床粟酒帐》，提到某某祠下（75TKM91:12）^④。按同墓出土文书年代在西凉建初四年（408）至阚爽建平五年（441），估计后两件文书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2006 年征集的吐鲁番新出文书《北凉计贳出献丝帐》，其中有杜司马祠、杨田地祠纳献丝记录，年代据考证在承平七年（449）前后^⑤。

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 S. 2925《佛说辩意长者子所问经》题记：“太安元年〔年〕在庚寅（450）正月十九日写讫〔于〕伊吾南祠，比丘申宗手拙人（尔）已，难得纸墨。”^⑥伊吾在今哈密，在敦煌、吐鲁番之间，该写本古代流入敦煌，而为寺僧保存下来。因伊吾与高昌毗邻，佛教寺院名称的变化应当是一致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地字 76 号《戒缘》卷下题记：“比丘法救所供养经。太安四年（453）七月三日唐儿祠中写竟。首薄可愧，愿使一切（下缺）”^⑦。

王树枏旧藏吐峪沟出土《佛说菩萨藏经》第一题记：“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457），祠主道（后缺）。 ”^⑧此为凉王大且渠安周供养经。

到目前为止，佛寺之称做祠，还是王素考证的 460 年为下限。

何时称“寺”，吐鲁番没有材料。敦煌北魏景明元年（500）写经初见“定州丰乐寺”（S. 2106）^⑨，然不在西北地区。

至于吐鲁番文书中“岁次××”和“××岁”有年代不同的说法，实无太强有力的根据。前举《优婆塞戒本》卷七题记称“岁在丁卯”，两年以后的董毕狗所写《法华经》，就署“己巳岁”，时为 429 年。所以，这个证据是难以成立的。

二、胡天和太后祠

《金光明经》题记的主要内容，即“庚午岁八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文义很清楚，意思就是庚午年八月十三日，在高昌城城东的胡天南面的太后祠的下面，为名为佛子的索将军及妻、子全家，写此《金光明经》一部。

1998 年，我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一文中说：“据此知当时高昌城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66 页。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77 页。

④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78 页。

⑤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待刊。关于该文书的详细情况，参见裴成国《吐鲁番新出北凉计贳、计口出丝帐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 年第 4 辑，65～103 页。

⑥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86 页，No. 84。笔者略有补字。

⑦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86～87 页，No. 86。

⑧ 书道博物馆藏卷。《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87 页，No. 89，图 12。

⑨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94 页，No. 111。

东立有供奉胡天的祆祠，它的存在，表明信奉祆教的粟特人的存在，因为从石城镇、伊州、敦煌、凉州等地的情形看，祆祠往往立在粟特胡人聚落当中。因此，虽然现存的吐鲁番文书中粟特人名的大量出现是在6世纪，但上述胡天的记载已经透露出粟特人应当早在5世纪前半即已进入高昌，其聚落的位置很可能是在高昌城东部，这和敦煌粟特人聚落的位置正好相同。”^{②7}

2000年，我又在《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一文中申论这条题记的内容说：“从写本书法、题记中的专名等综合来看，庚午为430年，表明早在高昌郡时期，祆教已经进入高昌，并在高昌城东建立了供奉胡天的祆祠。这所祆祠一定是那一带有名的建筑物，因此人们把它当作太后祠的地理坐标。”^{②8}

2005年，我根据吐鲁番新的考古发现，在《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一文中再次讨论到这条题记：“最近，在位于高昌古城外东北方向的巴达木乡，发现了一处墓地，出土有延昌十四年（574）的《康虏奴及妻竺氏墓表》和延寿七年（630）《康浮面墓志》，表明在墓地附近，应当有一个粟特人聚落，这个聚落正好可以使我们和高昌城东的胡天神祠联系起来。”^{②9}

对于笔者和大多数学者来讲，《金光明经》题记中的“胡天”系指高昌地区供奉胡天神的一座祆祠^{③0}，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在《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一文中，我对吐鲁番文书中的“胡天”、“天”应当指祆神或祆祠的说法做了论证，并对其其他解说做了论辩^{③1}。

但是，在2004年4月我和法国同行一道主持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丁博士对于多数论者的“胡天南太后祠”的理解提出质疑。在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我们收录了他的《南太后考——吐鲁番出土北凉写本〈金光明经〉题记与古代高昌及其毗邻地区的那那信仰与祆教遗存》一文^{③2}。王丁认为现有讲法的一个弱点在于“高昌城东胡天南”的描写有些累赘，先说东再说

^{②7} 原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此据拙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4~45页。

^{②8} 原载《欧亚学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80页；又拙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01页。

^{②9} 《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11页。

^{③0} 除了上面提到的论著外，还请参见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168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236页；又《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87页；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所见伊朗地区宗教的踪迹》，《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页。对于吐鲁番文书中与胡天相同的指称祆神的“天”，林悟殊认为是高昌地区对天体自然崇拜的传统信仰（见所撰《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89~97页，及“A Discussion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eaven-God in the Qoco Kingdom and the High Deity of Zoroastrianism”，*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XXIII，1993，pp. 7~12），陈国灿认为是当地普遍存在的崇信道教天帝神的习俗（见所撰《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国的流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期，1988年，13~18，12页；又见《吐鲁番学研究专辑》，乌鲁木齐，1990年，126~139页），谢重光认为是某种佛教之外的当地信仰（见所撰《麹氏高昌的寺院经济》，《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92页，202页注67）。

^{③1} 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原载《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此据《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82~285页。

^{③2} 载荣新江等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430~456页。